

【文学与艺术研究】

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元素的互文性研究*

刘静观 刘杨

摘要:杨绛译作和创作中的幽默品质既有内在的强关联性,也有外在的差异性,其译作和创作的幽默表达风格形成一种典型的相互反哺关系。在译作的幽默风格影响下,杨绛自身的本我智慧与悲悯情怀的乖讹化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她慈悲冷峻地注视众生,笑中含泪地铺展幽默,睿智达观地行走世间。她丰盛、平静而又多姿多彩的文学精魂和幽默品质,留存在她的著作和译作中,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杨绛;创作;译作;幽默风格;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8-0160-05

作为我国女性作家兼翻译家的杰出代表,杨绛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成就灿然可观。20世纪30年代,杨绛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角,40年代末她将主要精力转向翻译,开始向国内读者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她先后翻译出版5部作品,其中的《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珂德》是典型的“流浪汉体小说”,也是其翻译生涯的代表性作品。杨绛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着眼于人性百态,始终充满着乐观精神的幽默表达。张韩认为,杨绛的幽默创作在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同时,也受到其翻译的三部流浪汉小说幽默精神的影响。^①正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所言,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②。因而,文学创作文本和文学翻译文本之间也必然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本文在对杨绛不同时期译作和创作幽默风格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幽默元素进行互文性研究。

一、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元素的相互影响

翻译外来作品,既是一个输出精力和才华的再

创作过程,也是一个针对其他民族文化营养的学习吸收过程。译者的民族文化根基、成长背景,以及母语元素和个人的语言风格等,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译作的语言风格。杨绛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审美取向,为她能够充分而又深刻地理解母语之外的文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杨绛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她那种兼收并蓄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及自身形成的语言风格在无形中渗入译作之中,使得译作珠联玉映,锦上添花。在对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中,杨绛融入了汉语的语素和自己的语言风格,将西班牙谚语翻译得合辙押韵,就像汉文化中的对联,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使这些带有幽默意味的西班牙谚语更加幽默风趣,新奇隽永,回味无穷。

杨绛在翻译三部“流浪汉体小说”的过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意境和欧洲文学的精神内涵紧密结合,将中华文化附带的幽默元素渗入西方文学的文脉之中,将原著语言中的句式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民间俚语、俗语、谚语转化表述,形成独特的幽默风格和独有的表现方式,实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杨绛幽默观对其译作中幽默风格的影响研究”(2019-ZZJH-510)。

作者简介:刘静观,女,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新乡 453007)。

刘杨,女,莽原与南腔北调杂志社副编审(郑州 450008)。

学的“营养反哺”。这使得她笔下的译作语言在英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的乡土气息里带上了厚重的中国味儿,更贴近并适合中国的读者。

在杨绛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小说翻译和文学创作是两种最主要的方式。《堂吉诃德》于1978年出版,标志着杨绛的翻译生涯暂告一段落。在进入新时期之后,杨绛的文学写作开启了崭新的一页,《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洗澡》等作品陆续出版,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出版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们仨》。此后,她又继续写作并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散文集。在杨绛晚期的文学作品中,从文学翻译活动中汲取的西方文化元素的影响痕迹展现得十分清晰,她时常在行文中不露痕迹地把这种幽默元素糅合进创作中。比如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这样写道:“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地终夜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偌大四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以流浪汉的乐观精神和反抗意识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正能量,深刻地影响着杨绛的人生态度,即使在后来的运动中被下放、被批斗时,她仍能自嘲小癞子或堂吉诃德来自嘲、自慰,乐观地面对人生。流浪汉身上潜藏在幽默形态之下的人情世态,影响着杨绛的审美趣味,表现为她在生活中时常自嘲、自诩、自抑,往往貌似无厘头,实则大有欧式的冷幽默范儿。杨绛把翻译“流浪汉体小说”时所获的西方幽默元素,糅合在自己的幽默风格中,并在充满烟火气的平凡小事里解构着世间的种种日常。

二、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表现的相通性

在杨绛的译作和创作中始终蕴含着“一种超脱困境的轻松的、宽容的幽默”,这“是她超越苦难、荡涤心灵的法宝”^③。这种幽默在杨绛的创作与译作中具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笔下人物充满宽容、善意、同情

杨绛三部“流浪汉体小说”译作中的主人公都是流浪汉,流浪生活的共性使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家园。在人生与命运无法改变时,他们用自我嘲讽、

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内心坚定的反抗。他们虽然被生活所迫,颠沛流离,但身上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精神。杨绛曾在《小癞子》的“译本序”中表示,自己对三个主人公及其余的众多人物没有“怨苦忿怒”,而是充满了“宽容的幽默”^④。

杨绛文学作品中的很多人物虽不是现实中的流浪者,却也多是普通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比如《老王》中的“老王”、《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中的“老头子”、《临水人家》中的“皱面先生”等,这些小人物大多命运多舛,经历曲折,是精神上的流浪者。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监管她的人称她为“披着羊皮的狼”,她却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凶恶,反而称其为“披着狼皮的羊”。一字之差,体现出杨绛包容、宽厚、善良的人生态度与幽默品格。杨绛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时,均体现出一种宽容、体谅、善意的幽默。

2. 包含着笑与坚守的自嘲

真正优秀的翻译家,不仅仅能将一种语言机械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且能够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思想、风格与智慧进行艺术的再创作。杨绛较为重要的翻译作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的。作为走进新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她的骨子里隐含着传承千年的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因而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融入其对国家的关心和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的结果通过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在技术层面体现为包含着笑与坚守的自嘲式幽默。在人生与命运无法改变时,杨绛往往用自我嘲讽、自我调侃的形式表达内心坚定的反抗。张韡等学者认为,“杨绛的自嘲型幽默运用的是自我贬低、自我降格的手法”^⑤。

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手法,在杨绛的译作中并不少见,比如《小癞子》中:“我脖子抓破是活该;我历次受罪都是为了口腹的过失,脖子是口腹之间的通道。”^⑥当时主人怒气冲天,不但抓破了他的脖子,还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可他无可奈何,只能用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反抗。在《吉尔·布拉斯》中,作家也成了嘲笑的对象:“我们那小僮跑来,大声对女主人说:‘太太,有个人要见见您,他穿件怪肮脏的衬衫,浑身污垢,您别怪我多嘴,我看他活像个诗人。’阿嬷妮道:‘叫他上来。你们各位坐着别动,来的是个作家。’”^⑦翻译家嘲笑作家,这自然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嘲”了。

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手法在杨绛的创作中也俯拾即是,比如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即用轻松的语气进行自我调侃:“我一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⑧“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⑨这些笑中含泪的自嘲式幽默,说明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杨绛能够把一件被迫为之的屈辱之事云淡风轻地对付过去,在不动声色之间令读者体会到她锋芒内敛后的倔强。

3. 运用“逻辑错位”手法形成乖讹化幽默效果

关于“逻辑错位”,孙绍振等人给出的定义是:“在一条思路、一条逻辑上落空的同时,又在另一条思路突然领悟到逻辑的落实,瞬息之间,不但体验了康德说的失落的惊异,而且还有顿悟的惊喜,如果光有失落的惊异,最多不过是滑稽而已,有了另一逻辑的顿悟,才可能产生隽永的笑。”^⑩

在杨绛的译作中,“逻辑错位”的表现手法时常出现,如《堂吉珂德》中桑丘请公爵夫人照顾灰毛儿,并说灰毛儿是自己眼睛里的明珠。在公爵夫人惊讶地问“什么灰毛儿”时,桑丘答道:“就是我的驴呀;我不称驴,常叫它灰毛儿。”这种处理手法,巧妙地运用了思路错位形成的幽默,往往出人意料,也更容易达到出奇制胜的幽默效果。

在杨绛的创作中,这种因思路错位或逻辑错位形成的幽默也经常出现。她擅长通过人物的无知引发思路错位型幽默,请看长篇小说《洗澡》中施妮娜的发言:“比如有人的计划是研究马拉梅的什么《恶之花儿》。当然,马拉梅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可是《恶之花儿》嘛,这种小说不免是腐朽的吧?怎么为人民服务呢!”^⑪《恶之花儿》是波德莱尔的著名诗集,这里张冠李戴,说得煞有介事,叫人哭笑不得,又让人回味无穷。在创作中,杨绛更多的是运用多义词句的歧解现象达到幽默的效果。因为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一个词语往往只有一个确定的意思,一个句子也往往具有多个逻辑重点,言者和听者理解的重点不同,从而形成幽默的反差。这种反差越大,其乖讹化导致的幽默效果也越明显。

4. 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营造幽默氛围

在创作和译作中,杨绛经常运用假设、双关、反讽、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营造幽默氛围,其中最常

见的是比喻。它能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如果运用巧妙,能让人在发笑之余产生联想和思索,从而达到幽默的效果。在杨绛译作中,比喻修辞运用非常普遍,诸如“他要眉眼送情,就像临死翻白眼儿。”^⑫“因为他把主人抓在手里,像一团蜡,搓得圆捏得扁的。”^⑬“他走上来夺过长枪,折做几段,随手拿起一段把堂吉珂德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堂吉珂德虽然披着一身铠甲,也被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⑭杨绛创作中巧妙的比喻手法也随处可见,例如:“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⑮“汪勃一张嘴像漏水的水龙头,滴滴答答不停地漏水。”^⑯

杨绛在译作和创作中通过连用、兼用等多种形式将辞格运用得炉火纯青。她不但用修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还能令语句增添趣味性和幽默感,使作品蕴含强大的感染力,进而增强读者的阅读趣味,使作品中含蕴的文学思想深入读者内心深处,最终影响读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表现的差异性

幽默是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展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时常因语言的歧义现象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引发并构成不同状态的幽默元素。对于杨绛而言,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作为跨文化背景下的两种文学活动,其幽默形态的差异性也就草蛇灰线地潜藏其间,这种差异性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1. 含蓄、温和与辛辣、尖刻之别

受长期接受的东方文化含蓄内敛的特质影响,杨绛在原创性作品中的幽默表现形式显得含蓄、温和。比如十年浩劫刚开始时,杨绛便被“揪出来了”,当时因为她不知何故,所以便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说,“‘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⑰。当年的“牛鬼蛇神”们被安顿在一个屋子里,“革命群众”随时可能闯进来检查,为了应付检查,她出主意不让难友们撤掉帘子,原因是:“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⑱杨绛这种对于世态人情的洞悉与熟稔通过天生的幽默感表现出来,尽管十分含蓄,却仍如漫画一般,通过简单的几笔勾画出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特点,畅快地彰显着个性的气质。美国散文作家梅比认为:“急智是才智的巧运,而幽默是天性的流露。急智是心灵的自觉的机巧,而幽默却出

自人性的深处,往往不自觉地性格中表现出来。”^{①9}回顾杨绛的人生历程,尽管她饱经沧桑,但岁月并未抹去她的坚韧,她没有失去对社会、对人生的信心,作品中一直饱含着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对善良人性的呼唤,其幽默之下永远是温情的流露和慈悲的注视。

与原创作品相比,杨绛译作中的幽默形式显得比较辛辣、尖刻。比如《吉尔·布拉斯》中:“他知道唐安那斯塔修是个软耳根子的醋罐子,因此就想出一条恶毒透顶的计策,不是混蛋想不出来的。”^{②0}“我不但出卖都统的实缺,也出卖勋爵的头衔。凭我弄来一纸勋位授予状,就把个好好的平民变成混账的绅士。”^{②1}在译作中,杨绛这种辛辣的讽刺针对的是世间的丑陋和荒谬,并不是为了讽刺个人,而是要“举起明镜,让千千万万的人在私室中照见自己的丑相,由羞愧而知悔改”^{②2}。

2. 细腻写实与夸张荒诞之别

在文学创作中,杨绛无论对于事物的描述还是对于幽默的处理,都充满着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机智。在《第一次下乡》中,杨绛以细腻幽默的语言,把生活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写得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子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②3}这种细腻的写实往往蕴含着温暖的幽默,读来令人在会心一笑之余,更能感受到生活的厚重与艰辛。

在译作中,杨绛更倾向于夸张、滑稽和荒诞的描述,更多地表现出冷幽默意味。《堂吉珂德》是杨绛译作中分量最重的一部作品,故事荒诞离奇,人物荒唐滑稽。作者塞万提斯用滑稽、夸张、荒诞的情节和语言塑造了一个行为疯癫离奇、内心正直勇敢的“骑士”,无论是堂吉珂德大战风车,还是他时时都要遵循骑士道的规则和精神、事事都要模仿书上骑士的僵化、教条以及他单恋邻村姑娘的自作多情,这种由夸张、滑稽、荒诞而形成的幽默效果贯穿始终。虽然在这些疯癫、荒诞、滑稽的文字背后,隐含着堂吉珂德的正直、侠义、忠诚和勇敢,但人们只看到他疯癫荒唐的一面,他也因此屡屡被人捉弄而吃尽苦头,最终因一事无成抑郁而死。我们翻遍杨绛的原创文学作品,无论在散文还是小说中,像这种夸张、

滑稽、荒诞型的幽默风格,几乎难觅踪影。

3. 女性意识与超性别意识之别

杨绛平静、淡然、充实地过好每一天,自守高洁,不带风尘,不染污秽,自始至终坚守心中爱的温暖和温馨,这种品格,正是经历了百年沧桑的杨绛先生所独具魅力的女性意识。^{②4}杨绛的性别意识在其散文、小说乃至译著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但因性别差异所构成的幽默形态,在其创作和翻译两个领域的表现形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杨绛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坦现着本我意识。本我在人性中的体现是无意识的,往往不被个体所察觉。比如长篇小说《洗澡》中“因为他离开了宛英,生活上诸多不便,简直像吃奶娃娃离开了奶妈”^{②5}的描写,典型地体现着女性本我意识主导下的幽默心理。在散文《回忆我的父亲》中,她在叙述家庭的温馨以及父母的爱情时,多处表现出女性视角下细腻而又温暖的幽默。比如:“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②6}谢春丽认为,在杨绛的短篇小说中,不仅深刻蕴含着作者对女性意识的探讨,同时也有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建构的社会秩序不合理性的批判^{②7},这种探讨或批判也往往呈现着女性意识主导下的幽默特质。

由超性别意识派生的“无我”形态,使杨绛的三部“流浪汉体小说”译作中体现出一种超性别意识的幽默表征。如桑丘说:“这个比喻好,可是并不新鲜,我听到过好多次了。这就像一局棋的比喻。下棋的时候,每个棋子有它的用处,下完棋就都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口袋里,好比人活了一辈子,都埋进坟墓一样。”^{②8}在翻译活动中,杨绛实现了对自身性别视角、认知和思维的多向度超越,她自觉地突破了传统文化几千年来赋予女性的文化视域、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特征,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目光审视外国文学中荒诞、滑稽外壳下的幽默内涵,并以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转换为汉语语境下的幽默信息,使其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4. 口语方言与民间谚语之别

一位卓越的作家首先是一位语言大师,杨绛自然也不例外。她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言谈话语,自然而然地引起喜剧性的冲突,进而呈现出独特的幽默效果。但杨绛在创作与译作中对语言的选择有明

显区别,她在创作中特别擅长使用汉语口语和吴地方言,在译作中却运用了大量外国民间谚语。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少年时随家人迁至苏州居住,又在东吴大学读书,因而对吴地方言十分熟悉。她在作品中巧妙运用大量吴地方言俚语,使行文欢快愉悦,带有浓郁的幽默意趣。比如《大王庙》中的无锡话:“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嘞!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嘞!’”^{②⑨}又如《回忆我的父亲》中的苏州话:“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唔,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⑩

反观其译作,其中虽然也有口语的运用,但最突出的是使用了大量具有幽默意趣的民间谚语。据笔者统计,在《堂吉诃德》全书中竟然使用了约 400 句(次)左右的西班牙民间谚语。尤其是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简直一肚子的谚语警句,张口就来,有时一段话中差不多全是谚语。在杨绛翻译的三部“流浪汉体小说”中,成群结队地运用谚语并达成显著幽默效果的段落并不少见,但这种情况在杨绛原创作品极少出现。这种差异性尽管是其在处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形式时有意为之,但更显示出了杨绛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四、结语

纵观杨绛先生译作与创作实践中幽默表达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尽管其幽默形态、表现方式等有所差异,却能殊途同归,不但让人忍俊不禁,而且让人在笑过之后又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琢磨、领会文字背后的内涵,进而启迪读者的心智。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下,杨绛自身的本我智慧与悲悯情怀在翻译和创作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幽默表达形式。这种译作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现象,将现代生活、民间立场与中国语言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以此成就了杨绛对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这种互文性不仅促成了她丰盛、平静而又多姿多彩的文学精魂和幽默品质,更以其独特的况味和风格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文学的语言实践中,具有独特的启示价值和典范意义。

注释

- ①杨绛:《杨绛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
②⑦⑧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92、165、185页。③郑士生:《杨绛先生的翻译与创作》,《人民政协报》2016年5月30日。④⑥《小癞子》,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71页。⑤张韡:《论杨绛幽默的表现形态》,《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年第12期。⑦⑫⑬⑭⑯[法]勒萨日:《吉尔·布拉斯》,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39、584、424、619、74页。⑧⑨⑲⑳㉑杨绛:《将饮茶》,三联书店,2017年,第142、165、26、156页。⑩孙绍振、汤化:《幽默学全书》,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页。⑪⑫⑳杨绛:《洗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86、266、3页。⑬[西班牙]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堂吉诃德》(上),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⑮⑯⑰杨绛:《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三联书店,2017年,第206、147、32页。⑱上海青年幽默俱乐部:《中外名家论喜剧、幽默与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⑲杨绛:《隐身的串门儿》,三联书店,2017年,第29页。⑳邹慧萍、张继业:《论杨绛散文的女性意识》,《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㉑谢春丽:《“见不到阳光的女人”——论杨绛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㉒[西班牙]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堂吉诃德》(下),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69—70页。

责任编辑:一鸣

An Intertextual Study on Humor in Yang Jiang's Masterpieces and Translation Works

Liu Jingguan Liu Yang

Abstract: There is strong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mor in Yang Jiang's masterpieces and translation works, which turns into a typical mutual feedback relationshi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umor in the translation works, Yang Jiang's use of incongruity, which embodies her wisdom and compassion, has changed in her subsequent masterpieces. Observing all beings in a sedate and compassionate way, she expresses her humor with a tearful smile and walks in the human world by great wisdom and philosophy. Her rich, modest and vivid literary spirit and humorous character in her masterpieces and translation works have become a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Key words: Yang Jiang; masterpieces; translation works; humorous style; intertextuality